

地位下降回避还是学历下降回避*

——教育不平等生成机制再探讨(1978 - 2006)

侯利明

提要: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家庭微观的教育策略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的?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将家庭的微观教育策略分为地位下降回避策略和学历下降回避策略,采用CGSS2006数据考察了这两个教育策略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位下降回避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并不大,只有在绩效主义被破坏的初中升高中阶段,这一效果才开始显现。(2)学历下降回避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这一效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3)父母是否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作为学历下降回避的重要分水岭,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分化起着关键作用。(4)学历下降回避作为家庭最重要的教育策略之一,其合理性依赖于中国学历驱动的社会背景、单轨制的学校系统和绩效主义的选拔机制等因素。

关键词:地位下降回避 学历下降回避 教育策略 教育获得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获得是影响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谁能够获得高学历,就意味着谁能够向社会上层流动(Treiman & Yip, 1989)。因此,通过对这一问题考察,不仅能够把握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机制和动向,也能够预测中国社会流动的总趋势。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关于教育获得的机制是什么,教育获得的趋势又如何变化等问题,很多研究从以下两个视角进行了探讨。第一个视角是从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宏观角度来展开的。邓中和特雷曼认为,在“文革”期间,国家采取了更为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对教育强

* 本文曾于2014年7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社会学年会上进行了报告,感谢中山大学的叶华老师、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李骏老师及与会同行对文章的意见和建议。《社会学研究》匿名审稿人也对文章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作者邮箱:houliming1318@gmail.com

有力的控制阻断了社会阶层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Deng & Treiman, 1997)。但是“文革”之后,伴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进程,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Zhou et al., 1998)。特别是市场化之后,教育费用的上升导致教育获得更多地受到了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那些社会上层和城市户籍的家庭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李春玲, 2003; 吴晓刚, 2009)。也就是说,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教育不平等更多地受到国家政策和体制变革的影响,并且左右教育获得的机制逐渐从政治的因素转换为家庭的背景(Zhou et al., 1998; 李春玲, 2003; 李煜, 2006)。第二个视角是从高等教育的扩招是否能够减少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来展开的。关于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认为,高等教育的扩招尽管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但是这些机会更易于被上层的家庭所获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仍然被维持下来,只有上层家庭子女的教育获得达到饱和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才有可能下降(郝大海, 2007; 李春玲, 2010)。但是也有研究认为,低层次高等教育的扩招给低阶层的子女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至少从量的角度来看,阶层间入学机会的差距并没有被明显拉大(刘精明, 2006)。同时,绩效主义的高考制度(刘精明, 2014)以及重点中学生源的多样性(梁晨等, 2012)也降低了阶层间的不平等。

关于教育获得机制的问题,上述的已有研究倾向于从宏观角度出发去解释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再生产,但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家庭或个人微观的教育选择和行动策略。正如布迪厄所说,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并非是简单地机械式地运转,而是个人和家庭“策略”的一种结果(Bourdieu, 1970)。一般而言,上层家庭的子女的确获得高学历更容易,但是从家庭内部来看,家庭的教育期待、教育投资以及升学选择等微观层面的教育策略对子女的教育获得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阶层的父母又是如何对子女的教育进行选择的,过去的分析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针对这一问题,戈德索普整合了宏观的社会流动理论和微观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认为对教育分层的理解不能缺少对个体和家庭策略的微观层面的分析(Goldthorpe, 1996)。片岡荣美(2001)和竹之下弘久(2013)也明确指出,家庭的教育策略是联系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的重要媒介,阶层间教育策略的不同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荒牧草平(2010)认为教育获得的过程是一种家庭理性的行为选择过程,教育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阶层之间“主观的教育志向性”的

差异。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微观的家庭教育策略能够更加直观地解释阶层间教育获得的差异,这对把握中国的教育不平等是有必要的。

二、地位下降回避策略和学历下降回避策略

“个体的策略并非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Bourdieu, 1970)。家庭的教育策略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例如,经济资本的庇护策略、家庭的教育投资策略、少子化策略等)和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例如家庭的文化资本策略)(片冈荣美, 2001)。教育策略的选择不仅受到家庭背景的制约,也受到各个国家的制度、教育和文化差异的影响(竹之下弘久, 2013)。例如,在文化选拔性很强的法国,文化资本策略被认为是影响教育获得的最重要的策略(De Graaf et al., 2000; Sullivan, 2001)。而在竞争选拔性很强的韩国,父母为了保证子女的考试竞争力而采取的参加教育补习则被认为是最优的策略(Byun et al., 2012)。在绩效主义和文化选拔并存的日本,出于对女性地位上升的困难性和婚姻市场的考虑,父母倾向于采取传递给女性更多文化资本的策略;而对男性则会考虑到学历对收入的影响,从而采取重视学历的教育策略(片冈荣美, 2001)。

考虑到教育策略的复杂性,网罗所有的教育策略对本研究并不现实。因此,笔者并不试图将所有的教育策略都考虑进来,而更倾向于强调教育策略的中立性,即这一策略属于一种理性的选择,作为个体普遍具有的心理机制,这一策略并非是社会上层独占的策略。由此,笔者将理性的教育策略归纳为两类:地位下降回避策略和学历下降回避策略。下文中笔者首先对这两个策略假说的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比较,再在此基础上形成本研究的假说。

(一)地位下降回避假说

布东(Boudon, 1973)认为,阶层间的教育不平等有两个机制:原生效应(primary effects)和次生效应(secondary effects)。原生效应是指子女的学业成绩和表现与家庭背景相关;次生效应是指即使阶层间子女的学业成绩相同,阶层间的教育选择也会不同。布东强调了次生效应的重要性,认为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人和家庭对费用、风险和收益的偏好也是不

同的。埃里克森和琼森的理性选择模型扩展了布东的模型,通过对收益、费用和成功概率三个效用函数的推理,他们发现主观心理层面对教育选择的效果要高于客观经济层面的效果(Erikson & Jonsson, 1996)。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布瑞恩和戈德索普(Breen & Goldthorpe, 1997)认为阶层间教育不平等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3点:第一,对不同阶层来说,主观的教育成本和风险是不同的,这会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第二,阶层间文化资源的差异会导致学业成绩的差异,这会影响他们对子女升学成功概率的判断,进而影响到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第三,阶层间的教育选择是一种为了规避子女的地位下降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这一点被称为相对风险回避假说(Relative Risk Aversion,下文简称为RRA假说)。^①简单来说,父母倾向于选择让子女具有与父辈阶层地位相当或更高的教育,以规避子女阶层地位的下降。地位下降幅度对不同阶层的含义是不同的,对于低阶层的家庭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会比较小,而对于中上阶层的人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感受会比较强烈。综上,RRA假说作为一个微观层面的解释,着眼于地位下降回避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机制(Kahneman & Tversky, 1979),并通过与自我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导致的微观选择行为的差异建立联系(Keller & Zavalloni, 1964),以此来阐述阶层间教育不平等的生成机制。

基于RRA假说的实证研究广泛地出现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当中(Davis et al., 2002; Becker, 2003; Breen & Yaish, 2006; Holm & Jæger, 2008; 李春玲, 2010)。尼德和德容通过对荷兰高中生的研究发现,当控制住家庭收入、学业成绩、成功的期待和教育志向等变量时,社会阶层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力会明显降低,他们认为主观的教育费用、成功的概率和下降回避倾向作为RRA假说的变量可以用来解释荷兰高等教育不平等的机制(Need & De Jong, 2000)。戴维斯等人则将不平等的生成机制分为“学业成绩效应”、“费用负担能力效应”以及“地位下降回避效应”,通过分析丹麦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选择,他们发现即使控制住前两个变量,地位下降回避效应对子女是否进入下一教育阶段仍具有显著的影响(Davies et al., 2002)。布瑞恩和亚什则以教育与阶层的交叉点“信念”(beliefs)为着眼点,用英国男性的

^① 为了与下文的学历下降回避进行比较,本文中笔者将相对风险回避假说称为地位下降回避假说。

数据验证了不同阶层的信念对地位下降回避的重要性(Breen & Yaish, 2006)。范德沃霍斯特和霍夫斯塔德关心的则是地位下降回避效果对家庭的教育选择的影响力是否比文化资本效果更大。他们通过对阿姆斯特丹中学生的调查发现,阶层间的向下流动的回避倾向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从短期和长期的教育期待(ambition)来看,地位下降回避效果要比文化资本效果更大(Van de Werfhorst & Hofstede, 2007)。除此之外,埃瑟(Esser, 1999)的主观期待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以及贝克(Becker, 2003)微观的理性选择模型(micro-level rational action models of educational decisions)也都对RRA假说进行了考察,并且认为其假说对德国的教育不平等的生成机制具有适用性。但是斯托克通过考察德国中学生的升学选择发现,当控制住RRA假说的各个变量之后,阶层地位对升学选择的过程仍然具有很强的直接效果,他认为该假说并不是导致阶层间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因素(Stoche, 2007)。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地位下降回避是普遍的心理机制,父母并不希望子女将来的职业地位低于自己,他们更倾向选择让子女达到与父辈职业地位相当或更高的教育。由此可以提出假设1。

假设1:父母根据自己的职业地位而采取的地位下降回避策略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

(二)学历下降回避假说

通过对日本教育不平等的实证研究,吉川彻(2006)发现,父母是否具有大学学历对子女是否能够进入大学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父母的职业地位。对此,吉川彻提出了学历下降回避假说:父母倾向于选择让子女的学历相当于或高于自己的策略,以防止和回避子女学历的下降。他认为,与欧洲国家相比,在成熟的日本学历社会当中,父母将自己的学历作为参照点而采取学历下降回避策略,这个策略要比地位下降回避策略更适合解释日本教育不平等的生成机制。这一假说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

梅尔和张启惠(Mare & Chang, 2006)通过对美国和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父母都希望子女至少能够达到他们自己的学历水平。在美国,学历下降回避效果并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而在台湾,学历下降回避效果则对男性更加显著。范德沃霍斯特和安德森(Van de Werfhorst & Andersen, 2005)采用GSS数据,对美国家庭的

教育策略如何应对学历膨胀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在学历膨胀导致学历价值下降的时候,父母并不倾向对学历进行投资。这一结果否定了 RRA 假说(研究生阶段除外)。因为按照 RRA 假说,与父母相同的子女学历,如果其价值降低的话,父母就应该投入更多的教育以规避子女职业地位的下降。除此之外,他们发现了学历下降回避的效果:父母是否经历过某一教育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女是否进入该教育阶段。因此,美国家庭的教育策略更关注维持代际间学历的一致性,而非职业地位的一致性。近藤博之和古田和久(2009)发现,在日本,与父母的职业地位相比,父母的学历对子女学历的效果更加显著。那些父母仅具有高中学历的子女,其学历也倾向于停留在高中阶段,而那些父母具有大学学历的子女则更倾向于获得大学学历。藤原翔(2012)也通过分析日本高中生和母亲的匹配数据发现,当控制住包括阶层在内的其他变量时,父母学历对子女的高中选择仍然具有显著的影响。即使子女的学业成绩欠佳,高学历的父母还是倾向于将子女送入质量较好的高中去读书,这一结果与学历下降回避假说是一致的。齐亚强和牛建林(2012)分析了在中国的代际传承过程中的教育再生产的机制和趋势。他们发现,父母学历与子女学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际传承效应,子女的学历程度最有可能与父母中较高的一方学历程度相当。同时,当子代学历与父代学历存在差异时,代际间的教育流动也呈现对称性的特征,子女的学历程度与父母中较高的学历程度比较接近,相差较大的向上或向下的学历流动现象较少发生。同时,他们认为,当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不能实现时,父母往往会尽可能地缩小教育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是维持学历之间代际传承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在中国,父母倾向于把自己的学历作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重要参照标准,规避学历下降的策略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以上的已有研究,笔者认为学历下降回避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父母期望子女的学历至少能够达到他们自己的学历水平。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 2。

假设 2:父母根据自己的学历程度而采取的学历下降回避策略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

(三)地位下降回避假说与学历下降回避假说的区别

上述两个假说都强调学历在教育不平等的微观机制中所起的作用

用。但是,在对待学历这一问题上,两个假说是有区别的。笔者认为学历下降回避假说更符合中国的现实,理由包括以下几点:

1. 学校教育是地位获得的驱动力而不是中间媒介

RRA 假说强调父代与子代职业地位的一致性,子代获得必要的学历是为了规避地位下降的风险(Breen & Goldthorpe, 1997)。在 RRA 假说中,学历被看成是阶层再生产的中间媒介,当子代需要获得更多的教育才能达到父母的职业地位时,才会追求更高的学历去维持阶层的再生产。这一假说建立在欧美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基础之上。从欧美社会的历史来看,学校教育和产业化发展是在社会阶层结构已经稳定的前提下展开的。学校教育象征着支配阶层的身份文化,不同出身背景的家庭被允许进入的教育阶段也具有明显的区隔。社会阶层的差异无疑是决定再生产和社会流动最重要的动力。学校系统只是维持和固化社会阶层的一个媒介装置,并没有成为产业化和社会流动的驱动力(Dore, 1976)。从以上来看,学校教育的社会位置决定了 RRA 假说依赖于欧美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学历下降回避假说强调父代与子代学历的一致性,这一策略把子代学历看成路径的终点,而并不归结到子代的职业地位上(吉川徹, 2006)。这一假说更适合后发型产业化的中国,因为中国的学校教育不是维持阶层再生产的中间媒介,而是个人地位获得的驱动力。

“文革”之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产业化发展几乎是同步展开的,对于迫切需要吸收先进技术的中国来说,学校教育成为惟一能够改变旧形态的契机。国家有意识地将学校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通过学校教育来满足对知识、技能以及人才的需求。在国家层面来说,学校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对当时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级来说,学校教育又是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随着产业化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农民和工人阶级迅速分化,社会流动的速度也明显增快,更关键的是,那些获得中等甚至高等教育的家庭,很大一部分成为了中产阶级。可以说,在后发型产业化的中国,学校教育具有“后发效果”,^①不仅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促进了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分化以及中产阶级的产生,成

^① 道尔(Dore, 1976)在分析为什么后发型产业化国家的学历膨胀速度如此之快的问题时,提出了学历的后发效果。他认为在后发型产业化国家里,国家为了快速吸收先进国家的技术,巧妙地将学历隐藏在职业分配的过程中,学历对社会进步和社会流动具有强效果,人们对学历的重视程度也要远高于其他国家。

为社会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双重驱动力。学校教育的这一社会位置,促使人们对子女学历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对子女未来的职业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的关注度。

2. 学校系统是单轨制而不是双轨制

欧洲社会的学校系统属于双轨制。双轨制的教育系统意味着,父母在子女教育的早期就要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是进入“普通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条路径,还是进入“职业教育→劳动力市场”这条路径。因此,欧洲的家庭需要在子女教育早期就要考虑子女将来的职业地位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由于早期阶段父母对子女学业能力方面的信息量较少,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家庭中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资源来进行子女的教育选择(Erikson & Jonsson, 1996),上层家庭更倾向于选择普通中等教育这条路径,而下层家庭则更倾向于选择职业教育这条路径(Redpath & Harvey, 1989)。早期的教育分流作为一种冷却装置,能够在早期冷却父母对子女理想的教育的期待,形成一种与家庭背景相符的现实的期待。因此,越是早期的教育分流,出身阶层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就越大(Mueller & Karle, 1993)。可以说,双轨制系统下的教育选择过程与RRA假说是一致的。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以及美国的教育系统属于单轨制。在单轨制的国家,家庭不用在早期就考虑子女将来的职业地位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并且由于受教育年数(\approx 学历的高低)更容易换算成个人具有的知识和技能的程度,单轨制国家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待普遍比双轨制的国家要高(Buchmann & Dalton, 2002)。在6-3-3-4单轨制教育系统的中国,家庭在早期对子女学历的考虑要远远高于对其未来职业地位的考虑,这一选择过程更符合学历下降回避假说。

3. 淘汰赛流动和收益递增效果

在中国,家庭在早期阶段就倾向于让子女进入高质量的学校接受教育,认为一旦进入重点学校,意味着进入下一阶段重点学校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学校之间的质量差别导致了子女在早期阶段的学历竞争。这一教育分流过程更像是一种淘汰赛流动(tournament mobility):^①如果在某一教育阶段被成功筛选出来(进入重点校),那么胜者组的成员

^① 罗森鲍姆认为,淘汰赛流动是庇护性流动和竞争性流动的一个折衷形态(Rosenbaum, 1976)。

在下一教育阶段的成功概率就会很高。如果失败,那么败者组的成员即使很努力,在下一教育阶段的失败概率也会很高。也就是说,教育分流的过程是一个逐渐淘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一种收益递增的效果(Rosenbaum, 1976)。^①

按照 RRA 假说,高学历是回避地位下降风险的手段。尽管这一说明看上去合情合理,但是,从中国学生的学校生涯来看,这一假说不太符合常理。其原因在于,淘汰赛式的教育分流导致家庭的视野很难波及到将来的职业选择。对于多数家庭来说,子女能否在下一教育阶段获胜(进入重点校)是一个更加合理和现实的教育策略。从现实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父母和子女对将来的职业选择仍然比较模糊,很多学生直到高考结束填报志愿的时候,才会考虑将来的职业选择。

4. 学历的地位象征价值

在中国,高学历除了对个人的职业地位形成具有重要价值之外,其本身也具有非常大的象征价值。学历的象征价值不仅反映着一个人潜在的努力和能力,而且学历本身就是一个表示阶层身份的指标。太郎丸博(2014)通过对东亚4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发现,在中国,受教育程度水平是解释阶层归属身份的一个显著变量(仅低于收入水平变量),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认为自己的阶层高。而在同为学历社会的韩国和日本,受教育程度对解释阶层归属的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在中国,学历本身作为一个象征社会地位的指标,高学历的父母更认可学历的象征价值,并有意识地选择高学历的教育策略。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在中国,受儒教文化和科举传统的长期熏陶,供养孩子读书被视为崇高的家庭事业,子女获得高学历也被视为家庭的荣耀(刘精明,2014)。因此,对于中国的普通家庭来讲,子女获得高学历的价值和意义远远不是维持阶层的再生产,而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驱动力。综上,我们提出假设3。

^① 请注意中国与美国教育分流过程中收益的递增效果是有区别的。在美国,进入下一阶段时需要参考学生上一阶段的学业成绩。大学在参考学生的高中成绩时,会对不同学校之间的学业成绩进行相应的调整,即使在非重点的学校里获得了成绩A,也可能被调整为D。这对于进入重点学校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滚雪球式的收益递增效果,而对一般学校出身的学生来说,其不利效果也会递增。这种滚雪球式的不利效果会冷却那些进入一般学校的学生和父母的期待(Rosenbaum, 1976)。而在中国,进入下一阶段时并不参考学生上一阶段的学业成绩。从这一点来说,进入重点学校的收益效果要远小于美国,中国的淘汰赛流动比美国更接近于竞争性流动。

假设3:在中国,与地位下降回避策略相比,学历下降回避策略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力更大。

三、数据、变量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该调查运用多层次抽样方案,随机抽取了全国28个省市18-69岁的10151人作为样本,并搜集了被访者教育获得、家庭背景以及父母的学历水平等信息。由于在“文革”时期考试制度的废除和重视政治身份的选拔标准可能导致下降回避机制很难发挥效应,因此本研究选取了1978年之后入学的样本进行分析,样本量为5907人。

(二)方法和统计模型

本研究采用两个方法进行分析。首先使用路径分析。为了更好地梳理世代间学历和阶层之间的关系,笔者先借用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 1967)学历媒介的地位获得模型对世代间阶层再生产进行分析。由于背景和时代不同,尽管该模型对分析中国的地位获得有一定的效果,但也残留着不能测定的因素。笔者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父代学历这一变量。在新模型中,父代学历是地位获得的一个动力装置(路径的起点),笔者称之为学历驱动的地位获得模型。该模型不仅嵌入了学历媒介的地位获得模型,也反映了父代和子代学历之间的关联效应。通过对上述两个模型各个路径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的比较,我们可以判断世代间的学历传递在地位获得模型中的作用。

第二个方法是梅尔(Mare, 1980, 1981)的教育分流模型(transition model)。这一模型关心的是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各个教育阶段的分流过程。具体方法是把上一阶段教育分流(升学)的成功者作为样本进行逻辑斯蒂(logistic)回归,以考察阶层和学历对进入下一教育阶段的影响。这一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控制由于教育扩张和阶层变化所导致的边际分布的影响,其因变量(是否选择升学)也可以间接地反映父母的下降流动回避的倾向。

由于很难找到直接反映两个回避策略的主观变量,本研究采取间接的方法去考察家庭的教育策略。本研究的策略是,当控制住其他变量后,与参照组相比,判断各个阶层的子女是否更倾向于进入其职业地位所对应的教育阶段(比如,在高中升大学阶段,与蓝领工人相比,白领工人为了规避地位下降的风险,可能更倾向于让子女升入大学),或是判断子女的教育获得是否更倾向于进入其所对应的父母的学历阶段(比如,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与初中学历的父母相比,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父母为了规避学历下降的风险,可能更倾向于让子女升入高中)。

这一模型的公式可以记为:

$$\log\left(\frac{P_{ij}}{1-P_{ij}}\right) = \beta_{j_0} + \sum_k \beta_{jk} X_{ijk} \quad (1)$$

上述公式中, P_{ij} 是个体*i*从($j-1$)教育阶段(如小学)成功升学到*j*教育阶段(如初中)的概率。自变量*k*的值为 X_{ijk} ,自变量*k*的回归系数为 β_{jk} , β_{j_0} 为常数项。

(三)变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因变量为被访者在小学、初中以及高中毕业时的3个分流时期是否进入下一个教育阶段就学。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父母的阶层地位和父母的学历。

阶层地位变量:在CGSS2006数据中,由于没有14岁时父亲的职业变量,笔者使用18岁时的父亲职业变量来代替。为了防止自变量的繁冗,我们参照李春玲(2014)的分类方法,把父亲的职业分类简化为3类:白领工人层(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主和普通文职人员),蓝领工人层(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工人、制造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自雇佣者)以及农民阶层。

学历变量:笔者将父母学历程度分为无教育经历,小学学历,初中学历,高中学历(含普通高中、中专、职高和技工)和大学学历(大专和本科)5类。需要注意的是,由于CGSS2006的问卷没有单独询问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而是在询问家庭成员情况时才提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这导致了父母学历变量有很多缺失值。为了防止过多的缺失值所导致的样本缺失,在父母学历只有一方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即选用该学历作为自变量,而在父母学历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则选取了学历较高的

一方作为自变量。

出生世代:由于家庭的教育策略可能受到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教育扩招等因素的影响(竹之下弘久,2013),本研究将教育市场化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作为分水岭,将1978-2006年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讨论。

控制变量:已有的很多研究已经证明,性别(叶华、吴晓刚,2011)、民族(Hannum, 2002)、户籍(Wu & Treiman, 2007)、家庭成员构成(刘精明,2008)以及家庭文化资本(仇立平、肖日葵,2011)等因素都可能对子女的教育获得产生影响,故笔者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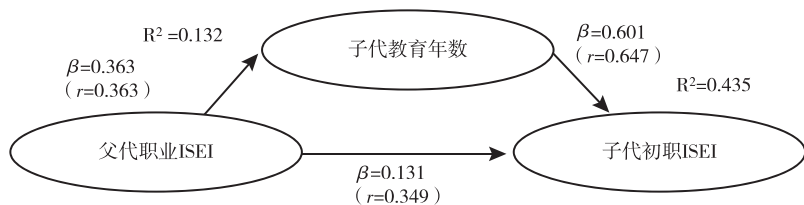
变量	升入中学		升入高中		升入大学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历史阶段						
1978-1991	2277	69.6	1175	32.7	326	9.1
1992-1998	1049	88.4	654	53.1	274	20.6
1999-2006	281	92.7	493	63.7	410	31.4
性别(女性)	2390	69.6	1304	38.0	507	14.8
性别(男性)	2224	80.7	1268	45.6	503	18.1
民族(汉族)	4366	75.9	2461	42.8	967	16.8
民族(少数民族)	268	57.4	111	23.8	43	9.2
户籍(农业户口)	1787	56.4	493	15.6	87	2.7
户籍(非农业户口)	2847	93.3	2079	68.2	923	30.3
兄弟姐妹数						
0人	836	93.6	690	77.3	404	45.2
1人	1050	87.2	642	53.3	249	20.7
2人	1005	75.8	522	39.4	164	12.4
3人	773	69.1	340	30.4	101	9.0
4人及以上	970	57.2	378	22.6	92	5.5
家庭藏书量						
无藏书	1303	54.4	394	16.5	67	2.8
10册以下	1468	80.3	766	41.9	247	13.5
10-20册	886	91.5	606	62.6	261	27.0
21-50册	509	93.7	412	75.9	199	36.6

续表 1

变量	升入中学		升入高中		升入大学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家庭藏书量						
51 - 100 册	273	95.8	229	80.4	140	49.1
101 - 500 册	154	98.1	133	84.7	76	48.4
500 册以上	41	97.6	32	76.2	20	47.6
父亲职业						
农民层	2005	59.7	685	20.4	220	6.5
蓝领工人层	1570	92.4	1066	62.7	411	24.2
白领工人层	789	93.0	616	72.6	286	33.7
父母学历						
无教育经历	759	50.1	239	15.8	51	3.4
小学	1513	71.6	660	31.2	187	8.8
初中	1298	88.6	809	55.2	295	20.1
高中	796	94.8	639	76.1	351	41.8
大学及以上	204	98.6	190	91.8	116	56.0
样本量	4634		2572		1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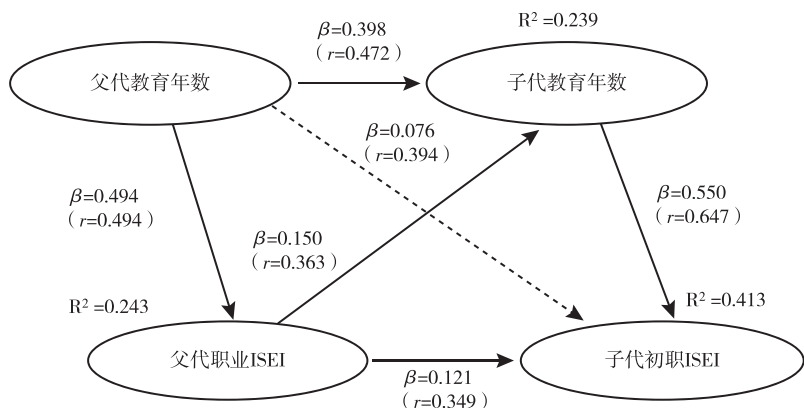
四、研究结果

(一) 职业阶层和学历的世代间关系的路径分析



注： β 表示回归系数， r 表示相关系数，实线箭头表示 $p < 0.01$ 。

图 1 学历媒介的路径分析模型



注： β 表示回归系数， r 表示相关系数，实线箭头表示 $p < 0.01$ ，虚线箭头表示 $p < 0.05$ 。

图 2 学历驱动的路径分析模型

表 2 职业阶层的世代间关系的路径分解

学历媒介模型	职业阶层的世代间关系	学历驱动模型	职业阶层的世代间关系
父代阶层的直接效果	.131 (37.5%)	父代阶层的直接效果	.121 (34.7%)
学历媒介的间接效果	.363 × .601 = .218 (62.5%)	学历媒介的间接效果	.150 × .550 = .083 (23.8%)
		学历再生产的伪相关	.494 × .398 × .550 = .108 (31.0%)
		其他伪相关	.494 × .076 = .037 (10.5%)
总效果	.349 (100.0%)	总效果	.349 (100.0%)

注：括号中的数值表示各个路径效果的百分比。

从路径分析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果。第一，图 2 显示，不管是父代还是子代，学历和职业地位之间具有强关联。在控制了父代学历和职业地位之后，子代的学历对初职的直接效果占总效果的 85.0% ($=0.550/0.647$)，而来自其他路径的影响仅有 15.0%。第二，图 2 显示，父代职业对子代职业的直接效果为 0.121，占总效果的 34.7% ($=0.121/0.349$)。换句话说，在阶层再生产过程中，大约 2/3 的效果可以由学历媒介的间接效果和学历再生产的伪相关来解释。第

三,图2显示,父代学历对子代学历的直接效果为0.398,占总效果的84.3% ($=0.398/0.472$),世代间学历的传递受职业阶层的影响较少。父代阶层对子代学历的直接效果则为0.150,占总效果的41.2% ($=0.150/0.364$),父代阶层对子代学历的传递中很大一部分效果来自父代学历。第四,表2显示,在学历驱动模型中,学历媒介的间接效果可以解释总效果的23.6%,而学历再生产的伪相关却能够解释总效果的31.0%。通过对两个模型比较,我们发现由于世代间学历传递的影响,传统的学历媒介模型中学历的间接效果估计过大了(0.0825被估计为0.21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管是父代还是子代,高学历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同时,高学历的父母对提高子代的学历也具有显著影响。世代间的阶层再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世代间学历的传递来完成的,学历传递成了子代地位崛起的重要路径。

(二)三个教育分流阶段的回归模型

表3给出了在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以及高中升大学的教育分流过程中,父母的地位下降回避和学历下降回避是如何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结果的。

1. 小学升初中阶段的家庭教育策略的结果

模型1显示,父母的阶层地位对子女的初中教育获得有显著的影响。在1978-1991年之间,与农民层相比,蓝领和白领工人层的子女更倾向于升入初中。而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显示,在1992年之后,父母的地位下降回避的效果消失了。其原因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初中的升学率开始迅速增加,到1999年升学率已经基本达到饱和。也就是说,初中教育的普及导致不同阶层的父母对子女是否进入初中的选择趋于一致。

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初中升学率达到饱和之前,父母的学历对子女的初中教育获得有显著的影响。与初中学历的父母相比,初中以下学历的父母并不倾向于让子女升入初中。具体来说,学历初中以下的父母,其子女升入初中的概率比具有初中学历父母的少了大约39.5% ($=1 - e^{-0.502}$) (1978-1991年)和43.5% ($=1 - e^{-0.570}$) (1992-1998年)。与父母为初中学历的相比,父母为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在是否升入初中的选择上,初中学历的父母与高中

表 3 1978 - 2006 年三个教育分流阶段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

变量	小学升初中			初中升高中			高中升大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性别(男性=1)	.351***	.410	.936	.285**	.143	-.026	.178	-.018	-.111
民族(汉族=1)	.249	.364	-.113	.191	.119	1.315**	-.123	-.513	.359
户籍(城市户口=1)	1.646***	1.664***	.740	1.679***	1.494***	1.746***	2.585***	1.332***	.755**
兄弟姐妹数量	-.114***	-.419***	-.446	-.007**	-.299***	-.298*	-.119*	-.187*	-.101
家庭藏书	.498***	.342**	.928*	.401***	.585***	.517***	.362***	.369***	.189***
父母职业地位	(参照组 = 农民层)			(参照组 = 蓝领工人层)			(参照组 = 白领工人层)		
农民层				.062	-.217	-.592*	-.365**	-.431	-.499
蓝领工人层	.414*	.589	.507				-.527**	-.011	-.309
白领工人层	.812**	1.101	—	.343*	.047	1.252*			
父母学历	(参照组 = 中学学历)			(参照组 = 高中学历)			(参照组 = 大学及以上学历)		
无教育经历	-.776***	-.422*	—	-.990***	-1.048**	-.501	-.821*	-.512	-1.751*
小学	-.502**	-.570*	.089	-.773***	-.884***	-.788*	-.558*	-.882*	-.907*
初中				-.412*	-.758**	-.092	-.414†	-.971*	-.715*
高中	.230	.765	—				-.006	-.447	-.082
大学及以上	.375	—	—	.555	1.227	.147			
常数	.606	.165	1.420	-1.619***	-.357	-2.313***	-3.920***	-.961	-.822
-2LL	2134.735	470.046	65.404	2431.850	908.382	493.857	1083.230	689.419	916.594
Nagelkerke R ²	.335	.277	.372	.361	.447	.528	.229	.200	.130
McFadden R ²	.308	.290	.494	.296	.428	.389	.170	.134	.080
样本量	2865	1060	265	2278	974	638	1061	570	714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及以上学历的父母的父母的教育选择并没有差别。模型3中,由于样本较少导致标准误很大,因此我们无法描述这一阶段的父母学历与子女学历之间的关系。但是可以推测,伴随着初中升学率的饱和,学历下降回避的效果也会逐渐减少。

2. 初中升高中阶段的家庭教育策略的结果

模型4和模型5显示,在1978-1998年这一时期,父母是否具有高中学历对子女是否升入高中有显著的影响。与高中学历的父母相比,那些高中以下学历的父母并不倾向于让子女升入高中。具体来说,初中学历的父母其子女进入高中的概率比父母具有高中学历的少了大约33.8% ($= 1 - e^{-0.412}$) (1978-1991年)和53.2% ($= 1 - e^{-0.758}$) (1992-1998年)。尽管初中学历的父母在子女是否升入初中的选择上与高中学历的父母并无差别(模型1、2),但在是否进入高中的选择上,高中学历父母的学历下降回避的倾向明显要高于初中学历的父母。与高中学历的父母相比,大学学历的父母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是否升入高中的选择上,高中学历的父母与大学学历的父母的父母的教育选择并没有差别。而在同一时期,父母的阶层地位并没有对子女的高中教育获得产生效果。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与父母是否是蓝领工人层相比,父母是否具有高中学历对子女的高中教育获得具有更加积极的影响。

模型6显示,在1999年之后,父母的学历对子女的高中教育获得的效果消失了,而父母的阶层地位的效果开始显现。与蓝领工人层相比,农民层的子女升入高中的概率少了大约44.7% ($= 1 - e^{-0.592}$),而白领工人层的子女升入高中的概率则是蓝领工人层子女的3.5倍 ($= e^{1.252}$)。这表明,在1999年之后,白领工人层比其他阶层更倾向于让子女升入高中。这一时期阶层地位的效果突然增大,原因可能是初中升高中绩效主义的破坏,给上层家庭提供了使用家庭资本直接转化为教育机会的可能性。很多高中教育机构为了确保教育经费的充足,会在入学门槛上设立双重的分数线,仅通过低录取线的考生需要交纳很多赞助费才能被录取,这无疑给上层家庭的子女提供了一种“败者复活”的机会。因此,这一阶段绩效主义的破坏导致阶层间地位下降回避策略成为可能。

3. 高中升大学阶段的家庭教育策略的结果

模型7显示,1978-1991年之间,父母的阶层地位对子女是否升入大学有显著影响,白领工人层更倾向于让子女升入大学。而模型8

和模型 9 显示,父母的阶层地位并没有对子女是否升入大学产生显著的影响。其原因是,与初中升高中阶段绩效主义的破坏有所不同,在严格依据考生成绩进行选拔的高等教育分流阶段,绩效主义为下层家庭考生获得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提供了形式上的条件(刘精明,2006)。尽管上层家庭也希望通过子女的教育获得来避免地位下降,但是由于绩效主义的强大作用,家庭资本直接转化为教育机会的优势并不能完全发挥其效果。

模型 7-9 显示,父母学历在任何时期都对子女是否升入大学有显著的影响。与高中以下学历的父母相比,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父母更倾向于让子女升入大学。但是,高中学历的父母与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父母的父母的教育选择并无差别。按照学历下降回避假说的观点,为了回避子女的学历下降,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父母要比高中学历的父母更倾向让子女升入大学。但是,这不能表明学历下降回避机制在这一阶段失去了效果。由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大,父母那个时代的高中学历与现在的高中学历不能同日而语。因此,高中学历的父母并不希望子女也仅仅获得高中学历,而是期望子女取得更高的学历,以保持学历价值的一致性。从上述结果来看,父母是否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是子女能否进入大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我们可以确认,在这一阶段学历下降回避仍然对子女的教育获得有显著影响,并且由于绩效主义的强效果,这一策略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市场化以及教育扩大等因素也并没有导致该策略的失效。

五、结论与考察

通过路径模型和教育分流模型,本研究得到以下结果:(1)父代学历→子代学历获得→子代地位获得的路径效果非常显著,学历再生产成为子代地位崛起的重要路径。(2)地位下降回避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并不大,只有在绩效主义被破坏的初中升高中阶段,这一效果才开始显现。但学历下降回避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这一效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3)父母是否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一个关键分水岭。那些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父母,其子女也倾向于获得高中及以上的学历。相反,那些初中学历的父

母,其子女的学历也更倾向于停留在初中阶段。(4)学历下降回避作为家庭最重要的教育策略之一,其合理性依赖于中国学历驱动的社会背景、单轨制的学校系统和绩效主义的选拔机制等因素。

本研究的结果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李春玲(2010)发现,尽管大学扩招以来,教育成本、收益以及失败的风险都不利于下层家庭的教育决策,但是阶层间的教育不平等并没有上升,RRA假说对解释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并不适用。吴愈晓(2013a)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政策的变化对教育获得微观机制的影响,发现地位下降回避的微观机制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并没有效果。但是,上述研究并没有明确表示这种策略在中国非适用性的原因何在。本研究的观点是:个人微观的社会行为和理性选择是在社会制度制约(choice within constraints)的前提下进行的(Kerckhoff, 1995; Nee, 1998)。家庭的教育策略也是如此。阶层结构和学校系统的制度框架制约着家庭的教育策略,而家庭所做出的教育选择也是在这个框架下的最优选择。欧洲家庭受到稳固的阶层结构和早期教育分流的影响,进入符合其身份地位的学校是各个阶层理性的教育策略。而中国家庭的教育策略则不受上述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学历驱动社会和绩效主义选拔的背景下,依靠努力主义的学历竞争成为最合理的教育策略。然而一旦绩效主义有所松动(例如高中阶段的双重录取分数线等),在新的环境下,没有制度约束的上层家庭可以通过改变策略去追求教育机会的最大化,导致阶层间教育不平等的增加。这也是在坚持以绩效主义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中,自致效果要始终大于先赋效果的一个原因(刘精明,2014)。

本研究最大的发现是,学历下降回避策略是影响子代教育获得的重要微观机制。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控制子代的学业成绩等原生效应,亦无法加入父母的教育期待等次生效应,仅通过客观的数据间接地考察了家庭的教育策略。其后果是,学历下降回避效果中可能包括了一部分原生效应的影响(例如文化资本),这是本文最大的研究局限。希望以后的研究能够控制住原生效应的影响,亦或能够对次生效应进行直接测量,以真正揭示阶层间和学历间教育不平等的生成机制。除上述局限性之外,本研究所涉及的教育策略仅考虑了是否选择升学,却并没有考虑到学校质量的选择。考虑到有效不平等维持(EMI假说)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吴愈晓,2013b),以后的研究有必要对学校质量的教育选择进行讨论。

参考文献:

- 郝大海,2007,《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李春玲,2003,《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阶层地位与制度要素对学历达成的影响(1940—2001)》,《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2010,《高等教育扩大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大学扩招的平等化效应的考查》,《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14,《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煜,2006,《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学历达成(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2012,《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刘精明,2006,《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社会》第3期。
- ,2008,《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2014,《能力与出身: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机制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 齐亚强、牛建林,2012,《教育的再生产:代际传承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第1期。
- 仇立平、肖日葵,2011,《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吴晓刚,2009,《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社会》第5期。
- 吴愈晓,2013a,《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2013b,《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叶华、吴晓刚,2011,《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社会学研究》第5期。
- 荒牧草平,2010,《教育達成における階層差発生過程のモデル化》,《九州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紀要》第56卷第13号。
- 吉川徹,2006,《学歴と格差・不平等:成熟する日本型学歴社会》,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近藤博之、古田和久,2009,《教育達成の社会経済的格差:趨勢とメカニズムの分析》,《社会学評論》第59卷。
- 片岡栄美,2001,《教育達成過程における家族の教育戦略——文化資本効果と学校外教育投資効果のジェンダー差を中心に——》,《教育学研究》第68卷。
- 太郎丸博,2014,《東アジアの労働市場と社会階層》,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社。
- 藤原翔,2012,《高校選択における相対的リスク回避仮説と学歴下降回避仮説の検証》,《教育社会学研究》第91集。
- 竹ノ下弘久,2013,《仕事と不平等の社会学》,東京:弘文堂。
- Becker, Rolf 2003,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of Education: Utilizing 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to Explain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Rates in Upper Secondary School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 Blau, Peter & Otis Duncan 1967,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Boudon, Raymond 1973, *L'inégalité des chances: La mobilité sociale dans l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Paris: Armand Colin.

Bourdieu, P. & J. Passeron 1970, *La Re – production*. Paris: Minit.

Breen, Richard & John H. Goldthorpe 1997, “Explain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 Towards a Formal Rational Action Theo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9.

Breen, Richard & Meir Yaish 2006, “Testing the Breen – Goldthorpe Model of Educ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n Stephen L. Morgan, David B. Grusky & Gary S. Fields(eds.),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uchmann, Claudia & Ben Dalton 2002, “Interpersonal Influences and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in 12 Countries: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al Contex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5.

Byun, S. , E. Schofer & K. Kim 2012, “Revisi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5.

De Graff, D. , P. De Graff & G. Kraaykamp 2000, “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A Refinement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3.

Davies, Richard, Eskil Heinesen & Anders Holm 2002, “The Relative Risk Aversion Hypothesis of Educational Choic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5.

Deng, Z. & D. Treiman 1997,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Dore, Ronald 1976, *The Diploma Disease: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Erikson, Robert & Jan O. Jonsson 1996, *Can Education Be Equalized? The Swedish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Esser, Hartmut 1999, *Soziologie: Spezielle Grundlagen, Band 1: Situationslogik und Handeln*.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Goldthorpe, J. 1996, “Class Analysis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Class Theory: The Case of Persisting 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Hannum, E. 2002,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by Ethnicity in China: Enrollment and Attainment in the Early Reform Years.” *Demography* 39.

Holm, Anders & Mads Meier Jæger 2008, “Does Relative Risk Aversion Explai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 Dynamic Choice Approach.”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6.

Kahneman, Daniel & Amos Tversky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Keller, Suzanne & Marisa Zavalloni 1964, “Ambition and Social Class: A Respecification.” *Social Forces* 43.

Kerekhoff, Alan 1995,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Stratification Processes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Mare, D. 1980, “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5.

——— 1981,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 Mare, R. D. & H. C. Chang 2006, "Family Attainment Norms and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he Effects of Parents' School Transitions." In G. Fields, D. B. Grusky & S. L. Morgan (eds.), *Frontier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Mobil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eller, Walter & Wolfgang Karle 1993, "Social Selection in Educational Systems in Europ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9.
- Nee, Victor 1998, "Sourc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Brinton Macy & Victor Nee (eds.),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ed, Ariana & Unlke de Jong 2001,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 in the Netherlands: Testing Rational Action Theo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3.
- Redpath, B. & B. Harvey 1989, *Young People's Intentions to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HMSO.
- Rosenbaum, J. 1976, *Making Inequality: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High School Tracking*. New York: Wiley.
- Stoche, Volker 2007, "Explaining Educational Decision and Effects of Families Social Class Posi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Breen - Goldthorpe Model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
- Sullivan, A. 2001,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ociology* 35.
- Treiman, D. & K. Yip 1989,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21 Countries." In M. L. Kohn (ed.), *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 Van de Werfhorst, G. Herman & R. Andersen 2005, "Social Background, Credential Inflation an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Acta Sociologica* 48.
- Van de Werfhorst, G. Herman & Saskia Hofstede 2007, "Cultural Capital or Relative Risk Aversion? Two Mechanisms for Educational Inequality Compare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8.
- Wu, X. & D. Treiman 2007, "Inequalities and Equalities under Chinese Socialism: The Hukou System an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 Zhou, X., P. Moen & N. B. Tuma 1998,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1949 - 1994."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

作者单位:日本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教育发达科学研究科
责任编辑:杨 可

Chinese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real situation, this study made use of the unfixed-sites survey and improved the original method. This study is also an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RDS used in the survey of migrant work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amples obtained by the RDS in this study reached equilibrium and converged rapidly in a few of recruiting batches. Thus, samples in this study have good representativenes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though RDS is not a completely random sampling method for the target groups, researchers can obtain an asymptotic unbiased sample through improvement and strict sampling procedure, and the bias of the sample can also be estimated. RDS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the surve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other groups which do not have a clear sampling frame.

Patterns of Divinity-Humanity Relations and Construction of Believing Model;Based on survey data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 China

..... *Li Xiangping & Li Feng* 174

Abstract:There are two opposing perspectives in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one follows the pattern of western traditional structuralism, the other refuses it and emphasizes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belief. This leads to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Chinese belief and western religion, diffused relig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 Drawing on data from the 2012 survey “Belief and Relig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paper represents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god-person relationship in shaping belief pattern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ism methodolog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olytheists are more identified with the reciprocal exch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than the monotheists; (2) the reciprocal exch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forms a private religious experience; (3) the monotheists' higher tendency of group religious experience is due to their lower inclination of reciprocal exch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The Chinese belief models and western religion structures are no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is the core of them, which is also the common platform to study religion sociologically both in China and western society.

The Relative Risk Aversion or the Credential Decline Aversion?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Educational Inequality (1978 – 2006)

..... *Hou Liming* 192

Abstract: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a, how do the family educational strategies affect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ased on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he family educational strateg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relative risk aversion strategy (RRA) and the credential decline aversion strategy (CDA). Using the data of CGSS2006,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 of these two strategies on the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is paper finds that: (1) the strategy of RRA has effect only in the stage as the children undergoes transition from junior school to high school, in which the meritocracy has been violated; (2) the strategy of CDA is robustly and persistently influential on the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3) whether parents have the high school education or above is a watershed of CDA, separating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4)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amily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n China, the strategy of CDA's plausibility is contingent with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credential driving force, the single-track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meritocracy selection mechanism.

Montesquieu's Society: A different attempt from the modern natural law tradition
..... *Yang Lu* 214

Abstract: Facing the breakdown of physical order of teleology in modern times, early thinkers were endeavoring to find another possible order for early modern society. The theme Montesquieu continued researching was the necessary relations of government, mœurs, law, human nature and other facto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on the one hand Montesquieu inherited the natural law as the supreme law for social life, on the other hand, he constantly explored the nature of society, namely the relations of all kinds of social factors, a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western autonomic society. Montesquieu held the belief that liberty consisted in the positive laws, which were based on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Under the scrutiny of Montesquieu's Society, we can enhance our knowledge of the substantive issues of sociology, acquiring some clues for the nature of problems in today's society.